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十九）

江燦騰

（2）關於日僧東海宜誠決心來臺發展的早期背景與來臺初期的困境

由於東海宜誠決心長期來臺發展後，對日治後期臺灣中南部臺人寺廟的影響極為重大，故此處引據新資料，就他的早期背景稍加說明¹。他其實是從小出家的（6歲），不過後來雖然他在日本也只讀到該宗5年制的全科聯合中學畢業，以及只有4年多（1912～1915）在日本臨濟宗南禪派的虎溪山專門道場修禪明道的宗教經驗，但他知道以本身的中學程度，要在日本國內競爭激烈環境中出頭很不易²，故他在「西來庵事件」爆發後的當年秋天南來臺島後，即下決心長期留在臺灣發展，並努力學習臺語，以至於他後來精通的程度，在當時來臺各派日僧中罕有其匹³。

並且直到日治時期結束，他才真正返回原出家的岐阜縣高野永昌寺任職（岐阜縣是愛知縣的鄰

縣，而這個縣是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主要分佈地區，永昌寺在該縣的武芸川，當地有6個佛寺，包括永昌寺在內，都是屬妙心寺派的）。

他來臺後，從大正5年（1916）10月30日起，至大正7年（1918）3月25日之間，據愚善的說法，他是「任鎮南中學林教授兼舍監」⁴。可是，「鎮南學林」一直被視為沒有「中學林」之稱的，為何愚善會如此說呢？

其實，根據《明治百年紀念佛教大年鑑》的說法，即可一目了然。因其中提到：「鎮南學林」是大正5年開設，作為準日本僧堂，以充當臺灣僧侶的修行道場之用，這應類似東海宜誠在日本臨濟宗南禪派的虎溪山專門道場的培訓模式，而「鎮南中學林」則是在大正7年獲得「公稱」⁵。

換言之，大正6年（1917）3月14日在《臺灣日日新報》所報導的「鎮南學林新設立是臨濟宗

「大飛躍」的消息，其實是之前的籌備會議，甚至於連向官方的申請都未提出。因其原內容是這樣的：「鎮南學林是在昨年 10 月 31 日舉行開林式……以臨濟寺住職長谷慈圓及同寺信徒總代星野政敏、中川小十郎、木村匡、木村泰治、吳昌才、王慶忠等人為始，與臺南開元寺、岡山超峰寺、竹溪寺、赤山岩、嘉義火山岩、臺北觀音山凌雲寺等相謀，希望依據私立學校令，向總督府申請許可。……本林的特色除培養本島僧侶及齋友子弟外，亦進而想擴大影響，促進中國佛教的革新。其課目有外國語、漢文、地理、歷史、數學等。……囊有『佛教中學林』，今設『鎮南學林』，實本島佛教界之福音！」⁶

可是，最先申請核准的「臺灣佛教中學林」，也要到大正 6 年（1917）4 月 11 日，才由曹洞宗在「臺北別院」旁的「觀音禪堂」開辦，以專供臺人子弟入林就讀。因此，若論申請通過，則「臺灣佛教中學林」其實是早在前一年（1916）9 月 18 日就提出申請——亦即在「大演講會」結束的第 3 個月中旬，並於同年 11 月 4 日，便獲當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1915.4.30 ~ 1918.6.5 在任）以「第 12377 號令」許可設立。⁷

反觀「鎮南中學林」由於是到大正 7 年（1918）才獲准設立，則之前東海宣誠所負責的，應都屬「准日本僧堂」的培訓性質，而非正式中學教育——因其只有中學畢業的程度⁸，故無有擔任中學教師之資格。

而這也解釋了之前可以一直擔任「教授兼舍監」，並以表現優秀獲獎的他，居然在官方於大正 7 年（1918）核准設立之後，卻反遭解職的原因。

同樣的情形，例如當時在「臺灣佛教中學林」擔任學監的沈德融，亦因未有大學畢業的學歷，故雖可私下教李添春等人的初階日語，依然無法出任林中正式的「中學教師」。

此外，根據林學周、愚善、《明治百年紀念佛教大年鑑》，這 3 種來源不一，但說法一致的事實來看，則所謂的「鎮南中學林」應是和最初草創的「鎮南學寮」，或籌備時期的「鎮南學林」，有其顯著差異性的，主要不同點應在於：

一、官方正式核准的時間。

二、所核准者為「正規中學」的性質。而這兩點，在大正 8 年（1919）「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前，因能對臺灣傳統的僧侶或齋友子弟提供社會中就讀中學的稀有機會，故吸引力是極大的。可是在

「臺灣教育令」一頒佈之後，對臺灣社會民眾來說，只要能力許可、有錢、有意願，都能在臺灣讀中學，而不必遠渡日本國內才能就讀。

如此一來，原先「鎮南中學林」所具有的優勢盡失，誘惑力跟著大減，甚至出現因經費不足，被併入「曹洞宗臺灣中學林」的悲慘下場。

特別是一直和長谷慈圓共同鼓吹、促成此事的「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在長谷慈圓過世後，於隔年（1919）除了向新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提出辛苦多年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之外，另一方面也不惜下海親任「鎮南中學林」的林長兼教授，但儘管如此，「鎮南中學林」還是因缺錢而無法辦下去。

並且，根據江木生在《南瀛佛教》第15卷第2號（1937年2月）發表的〈內地佛教の臺灣傳來〉一文，提到「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說明時，便說：「……此一教育機構，堪與曹洞宗所辦的『臺灣中學林』並稱，是被臺灣本地佛教界期望能對未來發展有大作用的兩大教育機構之一，不幸因經營者的『佛教道友會』財務發生困難，僅送出三屆畢業生即告廢校，並被併入『曹洞宗臺灣中學林』。廢校當時，擔任校長的前內務局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

氏，一面訓話，一面和在校學生灑淚相對的感人場面，迄今猶令與會者歷歷在目」。

又說「長谷慈圓師之前又已病逝，導致此一時期的臨濟宗在臺各項事業，全告頓挫，幾難東山再起。」⁹而東海宜誠和丸井圭治郎，卻正好在這一段期間扮演了過渡者的重要角色。（未完待續）

註釋

1. 此外，東海宜誠的佛教事業，涉及面甚廣，影響也非常深遠，可是，迄今不但臺灣的佛教學者罕有提及這方面的情形，僅王見川有一篇較佳的「略論」；至於在日本方面，連東海宜誠出身的本宗（臨濟宗妙心寺派）史書《增補妙心寺史——明治以降の妙心寺》（京都：思文閣，1975），對臺灣開教的部分雖有一些簡單的說明，卻完全沒提東海宜誠的重要貢獻，只是側重表彰初期開教的梅山玄秀和後期的高林玄寶如何成就而已。因此，對東海宜誠的重新探討和評價，也是需要的時候了。

2. 以職務來說，「知客」一職是最低職等的，因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教師的職等共分十級，名稱和級別如下：1. 再住和尚（1級）。2. 前住和尚（2級）。3. 準前住和尚（3級）。4. 東堂（4級）。5. 準東堂（5級）。6. 長老（6級）。前堂（7級）。8. 首座（8級）。9. 藏主（9級）。10. 知客（10級）。由此可以看出，知客是第10級，也就是最低職等。這和中國佛寺的職事，常將「知客」看作重要職務，有很大不同的。而東海宜誠的僧侶生涯就是從最低知客做起的。

因當時在臺日僧之間的語言溝通，可分四種情況：（1）透過翻譯者交談。（2）雙方使用中文筆談。（3）日僧學會臺語。（4）本島人學會日語。在當時的來臺日僧中，學會

臺語並能流利交談的，非常罕見，而東海宜誠卻是其中最著名的精通臺語日僧。甚至在昭和2年（1927）2月22日的獲獎文，即首先提到他「渡臺以來，專心島語學習，堅志持久，宣教傳道精勤」。事實上，他不只在本宗之內受肯定，連作為對手的曹洞宗日僧岡部快道（員林寺創立者）也在致其師忽滑谷快天（時任駒澤大學校長）的信中，加以稱道。所以東海宜誠來臺後，專心學習臺語，是他在臺佛教事業——和本島人聯絡時，得以順利展開的重要因素。為什麼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當時日僧來臺，主要打交道的，是日本在臺信徒；和本島人來往，通常要靠翻譯，在溝通上相當不易。而根據當時的資料記載：日僧不通臺語的原因，是沒有學習的意願——學會臺語要花費極多的時間和精力，可是一旦調職回日本或其他地區，臺語又派不上用場，所以寧可靠翻譯而不願花力氣來學會臺語。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東海宜誠的特殊之處，是他將臺灣地區的佛教事業，當作他的主要目標，因此才拼命將臺語學好，並且如預期的發揮了巨大的溝通效果。

4. 愚善，〈高僧略歷〉，《南瀛佛教》第7卷第2期（1929.2）頁77-78。
5. 佛教タイムス社編輯兼發行，《明治百年紀念佛教大年鑑》（東京：1967），頁197。
6. 轉引王見川、李世偉共著，《臺灣的宗教與文化》，頁73-74。
7. 李添春，〈臺灣佛教史資料：上篇曹洞宗史〉，《臺灣佛教》第25卷第1期（1971.11），頁1。
8. 按：東海宜誠在日本所受的佛教中學教育，是主要按普通中學的辦學方式進行，然後再兼顧佛教知識的吸收，所以日後要在高等學術機構深造或服務，也較無困難。在這一點上來比較臺灣傳統的僧侶學養，當然要超出許多。可是，東海宜誠如想在日本佛教界尋求發展，以這樣的程度還是不夠。因他並未進入4年制的「臨濟宗大學」，而這是高級部的課程訓練，他卻沒能進入，於是變成在學歷上差人一等，對

他在教內的升遷也是不利的，所以他要另尋方法解決。此即他進「臨濟宗南禪寺派虎溪專門道場」修禪4年（1912-1915）的背景因素。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妙心寺派於明治7年（1874），因臨濟宗九派聯合大教院廢止，早已自行獨立。明治18年（1885），妙心寺派按「宗教寺法」制訂本派管理規則，也獲政府的許可。在這種情況下，東海宜誠應該選擇進本派的專修道場才是適宜的。他之前沒進「臨濟宗大學」，可能是學業未符入學標準；可是「臨濟宗大學」之外，自己派下另有明治37年（1904）創立的「花園專修學院」和大正3年（1914）創立的「妙興禪林」，可讓他選擇。這也是專為派下子弟的教育而設的。可是，「妙興禪林」創立稍晚，而「花園專修學院」對他也未必適合，所以他才進入「南禪寺派虎溪專門道場」修禪吧？不論如何，來臺之前，既有5年制的中學畢業程度，又有4年修禪經驗，可說已具備了擔任佈教師的資格。剩下的，就看他個人的努力和教內對他的如何評價了。

9. 但，在事實上，因這是自長谷慈圓病死（1918年12月4日歿於任上）後，到較具影響力的高林玄寶來臺接任之前，一共歷經了多任住持，分別是：山崎大耕、平松亮卿、天田策堂、吉田萬賴、阪上鈍外計5位。可見這其實是一段人事更迭頻繁，佛教事業也績效不佳時期。因此，正好印證了之前江木生文章中所說的：「長谷慈圓師之前又已病逝，導致此一時期的臨濟宗在臺各項事業，全告頓挫，幾難東山再起。」